

從能指通向所指

凌 雲 陳麗中

語詞作為符號具有能指和所指雙重性。前者是語詞的詞形和語音，後者是語詞所蘊含的信息。符號信息的準確傳遞是符號(能指存在的前提)。那麼，符號的能指和所指是怎樣建立聯繫的？換言之，語言社會中的成員是如何把握語言符號的？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。

通常情況下，語詞的能指和所指的關係是顯豁的，即字面義對「所指」起了提示作用，如「甜菜」、「苦瓜」、「刀豆」、「腰果」、「丹頂鶴」、「牛毛雨」、「森林」、「大海」、「紅旗」、「鮮花」等符號的所指一目瞭然。但這種語言符號(能指)顯性的表義情況不能覆蓋所有的語言符號，有為數不少的語詞是不能「望文生訓」的。

一方面，語詞的字面不能準確揭示詞義指向。依據「能指」為「所指」提供的信息的多少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：

一、信息不足。如「狼煙」、「鴨梨」、「猩紅」、「鵝黃」這類偏正結構的限制成分對中心語素不能起到嚴格的制約作用。「狼煙」的所指是「燒狼糞產生的煙」；「鴨梨」的所指是「外形像鴨蛋的梨」；「猩紅」的所指是「像猩猩血那樣紅」；「鵝黃」的所指是「像小鵝絨毛那樣黃」。究其原因，漢語特別注重經濟性原則，語詞的構成極為簡約，且盡量控制在兩個音節之內，這樣的結果造成許多語詞不能「望文生義」。正如呂叔湘所指出的：「語言的表達意義，一部分是顯示，一部分是暗示，有點兒像打仗，佔據一點，控制一片。」¹最典型的例子是「謝幕」一詞，這個詞具體所指是「演出結束，閉幕，觀眾長時間鼓掌，幕布重新拉開，演員站在臺前鼓掌、鞠躬表示謝意」。造詞者抓住與這項傳統禮儀最關鍵的表行為的「謝」和從視線上把觀眾和演員隔離的「幕」兩個要素組成複合詞：「謝幕」。但信息解碼者要從字面上還原出「謝幕」的完整涵義恐怕是不可能的；又如「菜色」，從字面上看是指「像菜的顏色」，實際所指的是「荒年人民吃菜度日所表現的營養不良的臉色」(《現代漢語詞典》)；再如「首級」，秦代作戰時，斬下敵人一個頭顱，加爵一級，故而漢語詞匯中把「首」(頭)和「級」兩個詞素組合成詞，指代「斬下敵人的頭顱」。像「菜色」和「首級」這類詞只能從造詞者設定的意義上去把握。

1 呂叔湘：《語文常談》(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80年)，頁64。

二、信息不準。如「五官」，原指眼、耳、口、鼻、身，現在用於指眼、耳、口、鼻，實際上只有四官；「年會」可能用於指並非一年一度舉行的集會；「馬路」並非馬和馬車走的路；「海關」也並不一定是設在海邊的入境檢查機構。在現代產科醫術未發展以前，中國產婦是坐在高腳木盆上生孩子的，故生孩子稱為「臨盆」。隨著醫學的發展，產婦通常睡在產牀上或坐在特製的產椅上生孩子，但「臨盆」一詞並未隨著舊事物的消失而消失。漢語詞匯中出現這種現象，是由於人們對新生事物和對事物的新的切分，除了創造新詞，更多地採用「寓動於靜」的辦法，即保留舊詞形，而改變其所指，這就導致了詞的字面義和詞的所指對象之間不吻合。

三、信息間接。舊時，銀子五百兩為一封，二百五為半封，「半封」恰好和「半瘋」諧音，因而謔稱不通事理、做事魯莽的人為「二百五」。最近，部分地區的青年人把結婚戲稱為「飄柔」，這種說法源於目前流行的一種洗髮膏的牌號——「飄柔二合一」，採用藏詞的手法，只說「飄柔」而隱指「二合一」，而「二合一」又恰恰可用於指兩性的結合——「結婚」。再如上海有一種素麪，名為「陽春麪」，其說法來源於成語「陽春白雪」。說「陽春」，實際上隱指「白雪」，「白雪」又喻指白麪。這種符號的變異是為了在表達上風趣、優雅而追求「陌生化」的效果。

還有一種符號變異，是出於禁忌心理，有意把新符號與被替代符號在詞義上或語音上所引起的聯想隔開。²由於漢語文化中「吃醋」與男女間的妒嫉心理有關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把「吃醋」改作「喝小酒」。後來，「喝小酒」不幸也染上了「吃醋」的特殊語義，被人用來調侃，語言社會的對策就乾脆把「醋」叫做「忌諱」；因「豬舌」的「舌」與「蝕」諧音，故民間反其義改稱為「豬潤」或「招財」；「失火」舊時被稱為「走水」。與「死」和「性」有關的事情，我們也大多採用間接表達的語言符號。因「光榮」和「犧牲」常連用，故而將「光榮」隱指在戰場上「犧牲」。也有把「月經」稱為「例假」，把上廁所稱為「方便」等。

四、信息不明。漢語中有不少詞從字面上看不出詞的理據，如「嶄新」、「倒霉」、「哈腰」、「花生」、「腐乳」、「螞蟻」。這是因為語言使用中的謬誤和有意簡省，造成語素變異或脫落，從而導致語詞的理據中斷。「嶄新」最初寫作「斬新」，因為大家發現凡物剛剛經過刀斬切處特別新鮮，故把極新的事物用「斬新」形容，後來把它誤寫為「嶄新」，並且取代了「斬新」，構詞理據隨之消失；「哈腰」的詞義是彎腰，但「哈」和「彎」有甚麼關係無法看出。原來，「哈腰」本應寫作「蝦腰」，構詞理據是當人大幅度鞠躬時，腰彎如蝦。再如由於「倒楣」訛寫為「倒霉」，「渴睡」訛寫為「瞌睡」，使構詞的理據難以看出。「花生」全稱應為「落花生」，清代張璐在《本經逢原》論及構詞理據：「長生

2 參見雷友梧：《詞語的聯接作用與隔離作用》，《漢語學習》1991年第2期，頁23。

果，一名落花生，產閩地，花落土中即生。」「落」字簡省後，理據就不清楚了。類似的情況還有，「豆腐乳」縮略為「腐乳」，「芝麻醬」縮略為「麻醬」，「打火機」縮略為「火機」，「核桃酥」縮略為「桃酥」，「冬蟲夏蟲」縮略為「冬蟲草」等。

五、詞面不提供信息。漢語中大量的音譯詞如「沙發」、「尼龍」、「麥克風」、「布拉吉」，用字只記音，不表義；再如古漢語中遺留下來的聯縣詞，類似於音譯詞，「兩個音節綴合起來只表示一個詞素，表達一個完整意義而不可分拆。組成聯縣詞的兩個字，大多只是活口語的語音實錄」，³如「唐突」、「躊躇」、「猶豫」、「彷彿」、「螳螂」、「蹉跎」、「朦朧」、「逍遙」、「牢騷」、「尷尬」等。

另一方面，從外部參照的角度看，語詞的語義具有不可類推性。

一、字序。一般情況下，現代漢語中的同素反序詞在詞義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，如「蜜蜂～蜂蜜」、「音樂～樂音」、「語言～言語」、「詞根～根詞」、「鄰近～近鄰」、「犯人～人犯」。但也有不規則的情況，如「海拔～拔海」、「卷煙～煙卷」、「代替～替代」、「熊貓～貓熊」、「蠶蟻～蟻蠶」等同素反序詞是等義的。

二、語素的多義性。先看「馬」字的構詞：(a)馬車，(b)馬蜂，(c)竈馬。同是語素「馬」，(a)用的是本義；(b)用的是引申義，極言其大；(c)用的是比喻義。「竈馬」是一種昆蟲，因背部隆起，後肢長而大，善於跳躍而把「馬」作為命名的喻體。再看一組以「茶」為語素的構詞：

茶湯——糜子麪或高粱麪用開水沖成的糊狀的食品。

茶葉——經過加工的茶樹嫩葉。

茶油——用油茶樹的種子榨取的油。

茶花——特指山茶樹開的花。

顯然，以上四個詞中「茶」的所指是不同的。語素的多義性阻絕了語詞「望文生訓」的可能。

三、語素間呈現不同的語義關係。如「貓魚」是餵貓的魚，而「狗魚」卻不能類推為餵狗的魚；「香蕉蘋果」是有香蕉氣味的蘋果，而「梨蘋果」卻是指梨和蘋果嫁接後的新品種。再如下面幾組語詞的語義關係也是不可互相類推的：「曬太陽～曬衣服」、「站櫃臺～站崗」、「坐辦公桌～坐椅子」、「吃食堂～吃飯」、「跳水～跳傘」、「罵街～罵人」。

四、同義語素分別和同一語素組合成詞，兩個詞的詞義不同。如同義語素「頭」、「首」分別與「腦」構詞，「首腦」一詞指重要領導人，「頭腦」一詞指理智或思想；「眼」和

3 王小莘：《談談聯縣詞的望文生訓現象》，載《語詞源流漫筆》（廣州：廣東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140。

「目」分別和「眉」構成「眉目」和「眉眼」兩詞，在指容貌時語義相同，「眉目」還可用於指文章的綱要或事情的頭緒；同義語素「寒」和「冷」分別和「門」構詞，兩個詞的詞義大相逕庭，「寒門」指貧寒的家庭，而「冷門」則指很少有人注意的不時興的事物。

五、從字形上看似反義詞，實際上二者在詞義上不能反推。如「大姐」(排行最大的姊姊)和「小姐」(未出嫁的女子)；「大氣」(包圍地球的氣體)和「小氣」(吝嗇)；「熱心」(有熱情、有興趣)和「寒心」(失望而痛心)；「先生」(老師，或稱呼知識分子等身分的人)和「後生」(青年男子)。

語言的符號世界既然充滿了不規則，並保留不少訛誤，為甚麼絲毫不影響語言社會對符號的理解和運用呢？原因在於我們並不是依賴字面義或通過類推去獲取語言符號的所指，而是從整體上把握語詞，對語言符號建立起「語言直覺」，⁴能指通向所指的中介環節——「字面義提示」取消了。正如莫里斯所指出的：「一個符號的解釋，最後必須是歸於一種習慣，而不是歸於由符號媒介物所引起的直接的心理反應，也不是歸於伴隨著心理反應而產生的意象或感情。」⁵這裏所提到的「習慣」，便是我們常說的「約定俗成」。語言符號只要能正確地傳遞信息，就不會自行退出語言交際的舞臺。儘管語言社會不時有人疾呼要匡正語言中的訛誤，但響應者寥寥可數，那些被下了「通緝令」的語詞照樣「逍遙法外」，照樣運用於語言交際，就是語言研究所主編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也不得不承認現實，把那些不規範的詞語收入，讓正確和訛誤的兩式並存，甚而只收訛誤的而不收正確的，一切以使用頻率為選詞立目的尺度。由此可見約定俗成的力量。實際上又有多少詞是在瞭解理據之後才理解並掌握的(更何況，音譯詞和聯縣詞除記音表義外並無理據可言)？也許可以這麼說，我們具有非凡理解機制的大腦，造就了我們所處的這個充滿不規則的光怪陸離的語言世界。

4 雷友悟：《詞語的聯接作用與隔離作用》，頁23。該文對「語言直覺」有如下的定義：「所謂語言直覺，就是基於詞語的言語反映中的聯接作用而形成的詞語的理解方式。」

5 莫里斯：《符號理論基礎》。轉引自俞建章、葉舒憲：《符號：語言與藝術》(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)，頁278。